

黃際清

談東觀書室詩州

遜堂拜題



題讀東觀書室詩草

我郡咸同科舉裏，搗磨時文而已矣。終之士人爭出頭，
皆曰舍此無他恃。間有能者涉經史，斷無閒情到集子。
四庫提要曾編閱，時惟廣文先生耳。集內有臨別
四庫提要序香山性所喜，先生最喜
白傅詩遺詞造意頗相^{40x}。廣文又是有心人，懷古感
時寄繳旨詩家。陳楊雙峙_時，陳端崖楊鏡
川兩先生廣文晚出足繼起。靈沒詩名五十年，惜哉無人舉姓氏。今將白筆題東觀，
先生有知不吾鄙。

七六老人石銘吾未定稿



作者裔孫為本書敬書畫



根深葉茂本固
枝榮凌霜傲雪
歲長菁

辛巳中秋國慶雙節
黃山畫

根深葉茂 本固枝榮 凌霜傲雪
歲歲長菁

辛巳中秋國慶雙節
黃山畫 汝霖題

初春訪友不遇

寄身人海中常覺厭碌促閑置一室內又思騁遐曠念我平生歡
山居友康鹿決計往訪之何嫌客不速言俗誰料屨及門空復勞剝啄
屢喚不一應祇有禽鳥覺啞啞枝上曉似用慰客凄獨寂維時值春初
四山若新沐悅展好圖畫諦觀忠往復雖無賓主意頗得遊覽福
長揖謝山靈此來亦云足

除夜用東坡野宿常州城外韻

百年心事豈勝悲造化機緘孰闡微塵世何人非大夢官途幾輩
慶榮歸昂藏儘負頭顱好老大空憐鬢髮稀且喜臘殘身健在一

隨身行篋堆詩草 送老生涯仗硯田

——黃際清先生與《讀東觀書室詩草》述介

(代序)

曾楚楠

在潮州近代詩壇上，黃際清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却鮮為人知的作家。其原因主要是：先生『生性拙微逐』（《冬夜雜興》）、為人沖淡謙和而詩作又從未梓刊面世。《讀東觀書室詩草》（以下簡稱《詩草》）的出版，無疑地將為世人打開了一道了解際清先生的窗口。

去歲孟冬，姨父黃汝霖丈委我董理《詩草》的編校出版事宜，我有幸先期拜讀《詩草》的全帙手迹，欽羨、感慨之餘，因不揣淺陋，謹將披讀心得整理成文，權作紹介并就教於賢達方家：

始知爭命原無計 合向蓬門老歲華

黃際清先生生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卒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享年八

十週歲。

光緒《海陽縣志·選舉表四》貢生欄：「黃際清，光緒二十四年歲貢。」這是先生名字見諸地方志乘的唯一記載，而如此簡短的一行字，其背後却不知隱含了幾多苦難與辛酸。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先生十八歲（虛齡，下同）時即考中生員（秀才），春風得意，故其《入泮口占》有句云：『多士盡賡魚藻句，救時若箇是神龍？』頗以澄清天下、匡時救國為抱負。翌年甲子（一八六四），先生首次參加鄉試，舟行至老瀧埠即逢大水，該晚被迫由旅舍移避山樓，『人出陡聞牆屋倒』，以致他要『自笑觀光初學步，龍門未上險先撓。』亦許，這是一個不祥的兆頭，預示着他從此將踏上一條艱難曲折而又苦悶渺茫的科舉之途。

從甲子到癸卯（一九〇三）的三十九年中，先生曾十赴秋闈，但每次都失望而歸。本來，先生於科場制藝，既有家學淵源，且又聰慧過人、勤奮向學，早在少年時期便已具深厚根基。當他尚為童生時，在海陽縣令余鏡波選刻的《書院課藝》中，便有他的五篇時文入選。但在鄉試場上，却總是神差鬼使，功虧一簣，與舉人功名失之交臂。像庚午科（一八七〇），正主考因年老歿於道，由副主考謝麟伯代理一切事務，首場結束後，

謝主考已給他的試卷下了『義精詞萃，三藝一律』的批語，不料末場考罷，由於謄錄的書手字迹太差，朱卷被房官（同考官，閱卷者）棄之。（按：清代為防止科場作弊，考生的答卷用墨書寫，稱墨卷。交卷後，由彌封官鈐印送謄錄所，由謄錄書手將墨卷用朱筆照謄一遍，稱為朱卷）待到謝主考有所覺察以後，又因事務繁冗難以分身，祇能加上『惜無暇對墨』的批語（即無法調出墨卷校對）。幾乎到手的功名就這樣飛了，先生祇能苦笑一聲，聊發『庸知命所司，人力總難移』的嗟嘆（《懷舊詩·謝麟伯先生》）。

三度秋闈落選以後，先生未免有點意興索然。在庚午《秋闈報罷，與諸同人約展重九之遊》中，他無可奈何地說：『休嗟科第夙緣慳，幾許英奇老此間。坎壈已成吾輩例，酣嬉羨煞少年班。』但他畢竟仍未到而立之年，來日方長，故仍未失去信心，其《勸學篇——場後示及門諸生》云：『從古爭競途，神鬼環其旁。文字關福命，甘苦久備嘗。憶余甫弱冠，唾手掌芹香。謬謂前程遠，忽忽閱十霜。十霜兩叨薦，未許天衢翔……要之文字契，遭遇本靡常。人行有遲速，千里共梯航。花開分早晚，一例共芬芳。』不料，在第四次（癸酉科）赴考歸途中，剛至石龍時，上岸一跌，幾乎暈倒，負回舟中調理，而右腿酸楚，卒不能步。就在這一科，曾兩度携手同赴科期的李秋畹（李芳蘭，後為臨高教諭，曾參修光緒《海陽縣志》）獲幸高中，而先生是科『仍薦而未售』，因

此，在向文友表示祝賀的同時，他唯有深深地嘆息：『回頭悔印泥中雪，焦尾仍為爨下桐。』

封建時代，參加科舉考試，幾乎是士子施展抱負，追求建功立業、光祖耀宗的唯一正途，『諸生問業者，誰不志名場？』（《勸學篇》）先生出自書香門第（《緡閩（四庫提要）有作》云：『慚愧青氍窮學究，僅將席帽嗣家風。』）自不能外。雖然他在屢戰屢敗之後亦懊喪過、嗟嘆過，且為了一介科名而受盡磨難，但依然是屢敗屢戰，應該說這是時代風氣使然，正如其《羊城試寓咏懷》所云：『每到秋來悵別離，家山回首隔天涯。名心半為老親起，貧士原無久客資。』何況，他畢竟生活在一個西學東漸、新舊文化開始激烈碰撞的時代，因此，他並不像《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們一樣，沉緬於科舉的黑洞中不能自拔，而是結合切身的經歷，不斷思索以至有了逐步明晰的態度：

早在青年時期，他已『自笑籠東甚，隨人進舉場。榜前知下第，何苦冒風霜？』（《自笑》）在《經叢葬處口占三首》中，他有感於人生、世態的無常，甚至發出了『知道一丘無貴賤，人生何必定登科』的質疑之詞。登科與出仕，又是密不可分兩個環節。清末的官場，污黑一片，而先生對官場向無好感，其《觀劇》詩云：『君看袍笏滿，終有下場時。』（《遊春詞》云：『修禊緣何忽敗興？鳴騶呵叱來高官。』在《君子有

所思行》中，他尤其不屑於『門庭充貨幣，樓臺炫金碧』却又『取禍不終夕』的官們，對官場中『荊棘忽叢生，塵沙遭遷謫。抄沒到家貲，竄名入黨籍』的險惡現象深表疑懼。因此，越到後期，先生參加鄉試的意興越冷淡，已從『我要考』逐漸轉為師友親朋之『要我考』。這一點，從《余既除先君服，是歲又值鄉試。意念俱灰而同人勸駕者踵於門，躊躇匝月，始克成行》的詩題中已可略見其概。至晚年，在《新例，學堂教習准由地方官送考，余重達（按，重達即『難達』，典出《漢書·孔光傳》）當道意，又將有羊城之行，書此解嘲兼示堂內諸生》的詩題中則已表露無遺，而『無端蕉鹿夢重圓，黑漆前途再結緣。知否此身原傀儡，冥冥中自有絲牽』的詩文，更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對科舉的厭倦態度。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當他由生員擢為歲貢生，政治地位提高了一大步時，甚至連作詩紀念的興趣都提不起來。

正因為先生對科舉的態度由早年的熱衷慢慢地轉為惘然、坦然、淡然，因而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教書育人、獎掖後進方面。甲申（一八八四）科試，學使葉恂余按臨潮州，正場考畢，先生名列第一，其門生李曜初（即李旭升，今香港鉅商李嘉誠先生之伯祖）第二，等到選拔時，則李居正榜而先生居副榜。外界議論紛紛，頗加揣測，但先生『毫無芥蒂，且轉喜往昔獎借之非過也。』原來，李在應試前擬作《謝安論》，并持稿向

先生請教，先生加以點竄潤色，又援三國荀彧事迹加以比勘，結果該文得到學使特別的贊賞，李亦因此成為拔貢生，取得晉京會考的資格（乾隆以後，實行拔貢朝考制度，按成績揀選錄用）。先生乃撰《門人李曜初以乙酉拔萃，將會考京師，作此送之》二律，勉勵有嘉：『鉛槧相依近十年，一朝奮迹入幽燕。』『愧我難酬毛氏檄，期君早著祖生鞭。』（《後漢書·劉平王望等傳序》：廬江毛義，因家貧親老，府檄至，授以縣令，喜動顏色。及母歿，棄官歸隱，屢徵不出）甲辰年（一九〇四），先生主金山中學堂講席，其時科舉已廢除，但學使按潮時，仍循舊例令堂中諸生應考，榜發，中式者竟有二十八人，先生因撰詩一首以抒寫『他時豈便雲臺畫，此日居然星宿羅』之喜悅。像這一類體現師生情誼的詩作，《詩草》中比比皆是，且無一不是情真意厚，感人至深。其長者風範、坦蕩胸懷，若可摸觸。先生之所以能贏得門生故舊及世人之普遍尊崇，可謂其來有自。

一九〇三年癸卯，是中國科舉史上最後的一科。五十八歲的黃先生難違當道者之厚意，又將赴考。臨行之前，『有持示前科薦房錄者』，才知道自己已第八次獲薦卷。這一消息無異於止水投石，又激起他內心的波瀾。他不無憤慨地說：『傳來薦牘太遷延，數見殊嫌事不鮮。』『禹門未許凡鱗躍，魯縞難憑鈍鐵穿。自是才疏宜放棄，至公堂上本無

偏！』『可堪八度風回後，辜負三場筆吐花。韓子慣聞薦東野，漢廷終竟擯長沙。始知爭命原無計，合向蓬門老歲華。』然而，世上再無薦孟郊之韓愈，漢廷依然『屈賈諠於長沙』，這一科，先生還是落第了。

『歲費營巢輸鳥智，身甘裹爾比蠶痴。』（《自嘲》）『壯圖科第都成悔，老竭涓埃藉補貧。』（《學堂夜坐遣寂》）隨着科舉制度退出歷史舞臺，黃先生漫長的科舉生涯，終於畫上了浸滿淚痕的句號。

端居豈乏澄清志 看到桑榆一惘然

十上秋闈的經歷，未能搏得一介功名，却大大開拓了黃先生的人生視野，使他有別於一般的以『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自詡的秀才。

先生自小接受舊式傳統教育，以儒家『修、齊、治、平』的信條作為立身處世的準則，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勵，以澄清天下為職志，因此，從他的《詩草》中，我們時常能感受到突涌在他胸中的、以維護大一統為標識的愛國情懷。

當他登上廣州越王臺時，聯想到漢初『樓船排列蔽牂牁，南武當年倔強多』的分裂局面，他堅定地說：『今日車書歸一統，容誰更學老夫佗。』（《越王臺》）

在家鄉潮州的越王走馬埕，他推崇唐末刺史『劉公（安仁）當日蒞我潮，懔懔正朔奉中朝。政平訟理百廢舉，一鞭曾此策驚鑣。』而對其孫、五代南漢的創建者劉鋹的自取帝號則大加撻伐：『銜壁與觀終何補，翻願執挺長降王。』『往時侈托小南強，到此方知大北勝。吁嗟乎，巖疆坐鎮亦足豪，獨不見乃祖馬埕留遺愛，遠駕子陽蛙井貽笑嘲！』（《越王走馬埕懷古》）

正是出於這種熾熱的愛國情懷，因此當中法戰爭期間，我方取得諒山大捷的喜訊傳來時，他亢奮不已，一氣寫下了二十二韻的《題諒山大捷圖》，對以馮子材為首的將士們義無反顧、誓死抗爭、終於大敗法軍的豐功偉績予以衷心的褒頌，還頗為自豪地宣稱：『禹甸從茲恢疆域，為語鼠輩莫生心，有不來同視法國！』然而，清軍在戰場上連連告捷，清廷却在談判桌上敗塗地，中法之戰成為我方『不敗而敗』的戰爭，黃先生『禹甸從茲恢域』的願望完全落空。不久，甲午戰爭又爆發了，清廷銳意經營了十年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就在臺南失陷後，先生悲憤難已，寫了《感憤六首》，痛陳對『敵來如入無人境，師老空糜犒士錢』局面的殷憂，痛斥『往日擎天今掃地』，只知『輸金蹙境』的權臣，痛惜『從敵偷生』、『呼天無路』的邊民，緬懷『虎據雄三世，正朔當年尚恪遵』的鄭成功……但是，作為一名社會底層的窮學究，除了用筆來抒寫憂憤之

外，他還能作些什麼呢？『平沙莽莽雜飛埃，聞道緣邊釁又開。』『殺運釀成何日了，未能投筆請銜杯。』（《登高》）空懷澄清之志却報國無門，難怪他在『一代邊氛感道咸』之餘，要『狂來淬劍斫松杉』（《鎮海樓》）

先生生活在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行將滅亡的時代。在這個危機四伏、滿目瘡痍，守舊與革新、中學與西學激烈抗爭的特定歷史時期，每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都在痛苦地思索，都在探求醫時救國之良方，從而給自己的思想、言行，打下深深的時代烙印。先生雖非政界中人，但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却驅使他時時要去『放眼看世界』。於是，從有限的詩篇中，我們便可依稀看到一位在時代風雲中，內心世界充滿矛盾的讀書人：

作為僻居海隅、從小接受儒家教化的一介寒儒，先生自然要把中興大業的希望寄托在『好皇帝』的身上。一九〇〇年『庚子之變』，八國聯軍進京，慈禧、光緒倉皇逃往西安。當亂定回京時，先生作《回鑾頌》。其序言中竟稱：『皇上道懋懷柔、機神變化……今也念諸臣之敦請，體各國之懇誠，禁苑則指日肅清，聯軍亦聞風先退……共球畢集，定還一統無外之規；乚邕長安，合獻萬壽無疆之頌。』而在詩文中，他又天真地說：『天眷大清，群兇悔禍。競請回鑾，撫我育我……遺黎聞之，反側皆靜；四國聞之，前驅效命。從茲輯睦，盡復故觀。百千萬載，中外臚歡。』

亦許，這是當時的當道者所要求的、每位有點功名的士人都必須撰寫的『表忠、效忠』詞，因此，頌文中多有誅心之辭，毫不足怪。因為，從其它借史咏懷的篇什中，我們能更清楚地了解到先生心目中的對『明君』的期望：他向往『據秦除楚起沛豐』的劉邦（《漢高帝》），稱頌『天教神策建宏功』、『雅量能容羊鼻公（魏征）』的李世民（《唐太宗》），更推崇『銅馬千群手削平，漢家絕業復中興』的劉秀，甚至勸人『休疑郭后因私廢，黜附分明覆轍懲』（《光武帝》），以春秋曲筆，把矛頭指向西太后。另一方面，他譴責樂不思蜀、『談笑依然率故常』的劉禪，以至詰問諸葛：『丞相九原知悔否，錯欺閭弱取劉璋。』（《安樂公》）他慨嘆『一自降幡出石頭』、『可憐累世江東業，只博人間歸命侯』的吳末帝（《孫皓》）。褒貶之間，先生亟盼『中興明主』的心情，昭然若揭。

隨着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日趨頻繁與激烈，面對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的新事物、新潮流，先生的態度與認識尤為複雜：

他承認『西人斗巧奪鴻鈞』，先進的設施確能給人帶來極大的方便，但內心深處又總是有所排拒。像『以水運舟火運輪』的輪船，能『飛行助我登仙筏』，但不用舵師，多少有迷津之恐。（《火船》）有了鐵路火車，『關山侯尉真疑贊，驛騎郵傳枉自忙』，但『祇恐九州空鑄錯，藩籬撤盡寇難防。』（《鐵路》）有了電報、電燈，『無勞驛使走遐陬』，

『奇輝十丈射鰲精』、『入境真疑不夜城』，但太方便了，又恐『從今海角天涯遠，異地寧殊同室謀』；又覺得『映雪囊螢傳韵事，人工到底遜天成。』（《綫報》、《電燈》）

改革文風，廢除八股文，是當年新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先生尤感惘然。其《夜靜書懷二首》之一云：『老即倖成難報國，窮雖歷盡未工詩。人間迭出新花樣，我輩空憑舊筆枝。』顯而易見，他所采取的是不屑為伍的態度。邱汝濱先生《蕉窗隨筆》第一五五則謂：『黃際清先生工制藝……晚歲為金山中學教員，諸生文字膚淺，惟為句讀而已。人或問之，曰：「鐵杵磨針，徒費精神耳。」』先生長年為人師，如前所述，弟子學有所成，必喜而形諸歌詩，而晚歲對平庸學子之態度竟如此冷淡，當為文風扞格使然。

國勢日傾，先生熱切盼望當權者能早定『富國強兵』之策。他亦深知振興工商實業是增強國力的重要前提，因而在《學校夜坐遺寂》中說：『不須鑿空慕張騫，歐化東漸歷有年。學校盡開新世界，商埠爭開舊山川……後起何人醫國手，挑燈試讀管、商篇。』但是，任何醫國之方都必達到『黃種神州賴保全』，即『中體西用』、『以夷制夷』的目的。因此，他對『無地限華夷』的局勢十分憂慮：『一自通商肇海邊，中華從此遍華壇。擬將非種都鋤去，惡草其如已蔓延。』（《讀獨漉堂厓門詩感賦》）而對『逕欲用夷來

變夏』的維新派更是嚴加痛斥：『若乃內懷虺蜴，踵孟德劫許之謀；外結豺狼，為巫臣奔吳之地……假變法以售奸，斷傷元氣；刊報章以傳遠，漏泄軍機。』（《感事四首·序》）先生的內心世界，為何如此復雜、矛盾？試看其《放言》末首中的自白：『遼古安渾樸，晚季斗機巧。風氣之所趨，豪傑豈能矯？近時泰西治，富強凌八表……遂令我中華，士夫競搜討。見異輒思遷，傲尤悔不早……優勝劣則敗，誰暇與論道？技能重當世，消息已不好。』其《栽蓮》則曰：『種須留舊土更新，樹木分明等樹人。但使兒孫知此意，勝他要術讀齊民。』

看來，先生所要捍衛的，是傳統文化的精神家園；所要恪守的，仍是『夷夏之辯』的思維模式。所以，在涉及到道術與『機巧』、因循與變革等問題時，先生的態度便往往偏向於前者。這是時代的局限，更是歷史的必然。

難能可貴的是，先生從不矯飾，從不追逐所謂的時髦，他坦誠地以『吾手寫吾口』、忠實地披露自己的心迹。從這個角度說，《詩草》記錄了清季粵東地區部分知識分子在新舊交替中的心路歷程，具有至足寶貴的歷史價值。

秋來詩骨霜能傲 老去文心蔓盡刪

際清先生之一生，與詩學有不解之緣。他自謂：『詩外更無真契洽，花前時作小勾留。』（《重遊書樓與主人作竟日談》）『堪嗟學業都荒落，只有詩篇逐漸增。』（《感懷二首》）一直到晚年還說：『晚境頹侵漸不支，康強非復少年時……祇餘結習未消盡，得閒還吟幾首詩。』（《晚境》）

對於詩歌創作，先生的態度極其認真。其《詩集編成率題二律》之二曰：『無奈他年覆瓿何，且吟且讀學東坡。千金享敝嘲奚避，一字求安苦已多。』翻閱先生手稿，通編皆以端楷謄錄，觀者無不動容嘆服。而字裏行間，又屢有增刪批改之處，其一絲不苟之精神，堪為後學楷模。正因為先生自律太過，故《詩草》雖有十二卷，實際上僅錄詩五百九十六題九百六十首，如《韓江竹枝詞》原有三十首，後竟『奮筆刪之』，僅得十六之數。而六十歲以後作品更是寥寥無幾。但從現存數量不算太多的詩作中，我們仍可領略到《詩草》的特色與風格：

一、衆體兼備，題材多樣

《詩草》中衆體兼備。無論是古風、歌行、律絕，還是宮詞、竹枝，先生均揮灑自如，得心應手。

古風在《詩草》中幾占五分之一的篇幅，而且動輒幾十韻，可謂紮回盤礴、百態千